

第二屆

宋代文學

國際研討會論文集



莫砺鋒 編



江蘇教育出版社
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

第二屆

宋代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

莫砺鋒 編



江蘇教育出版社
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第二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/ 莫砺锋编. —
南京: 江苏教育出版社, 2003. 6

ISBN 7-5343-5136-7

I. 第... II. 莫... III. 古典文学-文学研究-中
国-宋代-国际学术会议-文集 IV. I206.2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41651 号

书 名	第二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
主 编	莫砺锋
责任编辑	王许林
出版发行	江苏教育出版社
地 址	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(邮编 210009)
网 址	http://www.1088.com.cn
经 销	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照 排	南京星光测绘科技公司
印 刷	江苏新华印刷厂
厂 址	南京市张王庙 88 号(邮编 210037)
电 话	025-5521756
开 本	850 × 1168 毫米 1/32
印 张	28
插 页	1
字 数	701 000
版 次	2003 年 6 月第 1 版
	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-1190 册
书 号	ISBN 7-5343-5136-7/G·4831
定 价	54.00 元
邮购电话	025-5400774, 8008289797
批发电话	025-3249327, 3249091
盗版举报	025-3204538

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邮购免收邮费, 提供盗版线索者给予重奖

目次

两宋时期南北文学异同论·····	祝尚书(1)
从高压政治到“文巧奔竞”	
——论“绍兴和议”期间的文学生态·····	沈松勤(26)
宋代梅花审美认识的发展及其成就·····	程杰(52)
试论宋代诗歌阐释学的主要倾向及其重心的演变··	周裕锴(67)
“万物静观皆自得”	
——儒家心学与诗学片论之一·····	张毅(103)
宋代诗学造平淡之说与禅学关系·····	刘卫林(122)
论宋代叙事诗·····	张仲谋(136)
宋夏战事诗题材论析·····	张廷杰(151)
漂流与回归:宋代题“潇湘”山水画诗之抒情底蕴··	衣若芬(176)
北宋“东州逸党”考述·····	崔海正(220)
水流云在,月到风来	
——论邵雍诗体及其对宋代诗坛的意义·····	邓红梅(241)
黄庭坚与王安石·····	内山精也(249)
环绕“苏门”起始兴盛的几个问题·····	巩本栋(295)
苏轼对白居易的文化受容与诗学批评·····	张海鸥(324)
论“小东坡”唐庚的诗·····	陶文鹏(349)
刘辰翁评点陈简斋诗研析·····	王次澄(371)
南宋使金诗与边塞诗之转折·····	张高评(395)
论南宋使金文人的创作·····	胡传志(444)

范成大使金绝句中“时间之对比”形塑“蛮荒北地”之修辞策略

- 黄奕珍(466)
- 论宋人词体观念的建构 王 昊(486)
- 唐宋“踏歌”考释(下篇) 张 鸣(499)
- 唐诗校勘《全宋词》
- 以北宋词为例 王伟勇(523)
- 论宋词与南戏曲调的关系 俞为民(560)
- 宋代咏物词的创作姿态 路成文(578)
- 苏词编年三则 保刘佳昭(592)
- 李清照的成就及其评价问题 施议对(606)
- 推尊词体与开示门径
- 周济《宋四家词选》札记 张宏生(622)
- 北宋士大夫的谪宦迁徙与散文创作 洪本健(641)
- 《宋史》论宋文 邓国光(650)
- 欧阳修“诗文集序”作品小论 何寄澎(678)
- 论李清臣贤良进卷 朱 刚(695)
- 苏轼散文创作与接受活动探析 王基伦(720)
- 苏门学士砚铭初探 卢庆滨(739)
- 论黄庭坚散文及其人文精神 杨庆存(769)
- 《太平广记》在韩国的流传及其影响 诸海星(798)
- 论宋代律赋 曾枣庄(811)
- 北宋科制与论理赋考述 许 结(837)
- 试论苏轼的辞赋创作 王许林(858)
- 《容斋随笔》中的西汉史研究 徐兴无(871)
- 后记 莫砺锋(891)

两宋时期南北文学异同论

四川大学 祝尚书

上世纪初叶,刘师培作系列论文《南北学派不同论》,其中有《南北经学不同论》、《南北理学不同论》、《南北文学不同论》等多篇^①。《南北文学不同论》认为,我国从远古起就音分南北,“声音既殊,故南方之文亦与北方迥别”。这种南北文学的不同,自上古迄明清,成为中国传统文学一以贯之的特点。刘氏所揭示的宏观文学现象,基本合乎历史实际。其实发现和提出这一问题的,刘师培并非第一人,早在刘勰《文心雕龙·时序》中,就言及春秋时代齐、楚(亦即南北)文学之异,而唐初史家李延寿的《北史·文苑传序》,更详论了南北朝文学的异同,等等;但刘师培在一篇不长的文章中上稽下考,将这一文学现象集中描述得面面俱到又自成体系,则是他独特的功绩。

在《南北文学不同论》中,刘师培论宋代诗文道:

宋代文人,惟老苏(洵)之作,间近昌黎(韩愈);欧、曾之文,虽沉详整静,茂美渊懿,训词深厚,然平弱之讥,曷云克免?岂非昌黎之文固非南人所能效哉?小苏之文,愈伤平弱;介甫之文虽挺拔,然浑厚之气,亦逊昌黎。若东坡之文,出入苏、张、庄、老间,亦为南体。苏门四子,更无论矣。北宋诗体,初重西昆,派沿温、

^① 载《刘申叔遗书》(见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影印本,改题《刘师培全集》)。

李。苏诗精言名理，有东晋之风。……西江一体，虽逋峭坚凝，一洗凡尘，然雄厚之气，远逊杜、韩；岂非杜、韩之诗亦非南人所克效欤？南宋诗文，多沿古制；惟同甫、水心，文体纵横，放翁、石湖，诗词淡雅，一近张、苏，一近庄、列。然咸属南人。

刘氏是说，北宋诸大家（欧、曾、王、三苏等）以南人而学北体（韩文及韩、杜诗），故皆逊而不及，说明北体“非南人所能效”（所论南宋诗文，将在后文述及）。其论大体不差，只是过于概念化和标签化，有时未免牵强失当（如谓陆游、范成大“近庄、列”），且其论旨在“不同”，未及“不同”也有时段性：在一定历史条件下，异又可能转化为同。本文试论两宋时期（包括与南宋同时并存的金朝）南北文学之异与同，力求在宏观审视中把问题说得较具体些，并略探文学异同之迁转流变的社会文化根源及其利弊。

一、北宋：北人多习经学，南人喜诵诗赋

南北文学不同，是个非常宏观的概念，如果就单个作家论（刘师培多如此），或从单篇作品看，有时很难说清问题。比如宋初诗坛的“西昆体”，属典型的“南体”，代表诗人杨亿、刘筠、钱惟演，杨、钱是南方人（杨为福建浦城人，钱为杭州人），而刘筠则是北方（今河北大名）人。正如钱钟书先生在解答“画派分南北和画家是南人、北人的疑问”时说：“从某一地域的专称引申而为某一属性的通称，是语言里的惯常现象。……拘泥着地图、郡县志，是说不通

的。”^①本文所论的“南”、“北”文学，也是如此。

《宋史·文苑传序》曰：“艺祖革命，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，宋之尚文，端本乎此。”然而立国于南北长期瓜剖豆分之余，各地学风不同，习尚互异，虽说皆“尚文”，发展却很不平衡，“文”的内涵也不尽相同，至少是整个北宋时期如此。欲论北宋时期南、北文学的不同，如果从学风对文学的影响着眼，也许问题将显得具体和明晰。我们似乎可将目光集中到涉及南北东西、牵动千家万户的科举上来。

且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(1008)正月二十一日君臣的对话：

冯拯曰：“江浙举人专业词赋，以取科名。今岁望令于诗赋合格人内兼考策论。”帝(真宗)曰：“大凡文论可见其才识。南人喜诵诗赋，及就公试，或攘剽旧语，主司能辨之乎？”王旦曰：“古人警句，非后进所及，苟窃用之，无不辨也。”^②

从对话中，可知对“南人喜诵诗赋”这点，上下几乎没有异议。的确，就广义而言，宋人无论南北皆喜文；但南北所习“文”之不同，相去却不啻千里：北人所喜乃经籍文，而南人则偏爱词章，也就是诗赋。

侯官(今福建福州)人陈襄(1017—1080)于嘉祐六年(1061)出知常州，曾在《常州请雇临秘校主学事书》中写道：

某窃以东南之学，废而不振也已久。安定先生(胡瑗)之

^① 钱钟书：《中国诗与中国画》，《旧文四篇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。

^② 《宋会要辑稿·选举》三之九。其中两“辨”字原误“办”，“警句”原误“惊句”，径改。

去吴兴，盖十余年矣。天下学者之兴，较之当时，固已浸盛，而东南之士，又常倍之。然而魁奇特起之才、礼乐恺悌之风，反不如吴兴昔时之盛，何也？岂非庠序之教，所由废兴也欤？……然常患近世之士，溺于章句之学，而不知先王礼义之大。上自王公，下逮士人，其取人也，莫不以善辞章者为能，守经行者为迂阔，而士之荣辱，亦从而应之。以是天下之士习非舍是，固已涂瞶耳目，而莫之能正矣。某自蒞事以来，惟日孜孜以兴学养士为先务，明经笃行为首选，其心如是，直将以待夫有志之士焉耳。^①

胡瑗曾在湖州讲学，力图振起儒教以挽学风，当时影响不小。但仅隔十多年，又复如故，陈襄感叹“东南之学”重词章而轻经学，并欲改变这种状况。他还在《答阮鸿秀才书》中说：“近世选举之失，取人以技艺之道。士之豪杰，有为有守，进于是者必穷，故天下学者丧失其本原，日以习词章进取为利，若往而不回者。”^② 在陈襄看来，“天下之士”竞为诗赋，主要是“近世”科举制度造成的。

其实不止东南，陈襄的故乡福建，就是酷好词章的地区之一。欧阳修《蔡公（襄）墓志铭》曰：“往时闽人多好学，而专用赋以应科举。”^③ 欧阳修的意思是表彰蔡襄尊经术之士，欲以改变“闽俗”。但事实上，蔡氏没有也不可能扭转闽地风气。

与东南、闽一样，蜀人也偏爱诗赋。宋杨延龄《杨公笔录》曰：“蜀人好文，虽市井胥吏辈，往往能为文章。熙宁中，余随侍在成都，兄长房生子，为三日会。有衙前史戴献诗，其警句云：‘月中又长一枝桂，堂上喜生千里驹。’兄弟异之。明日往诣厅房中，观其所

① 《古灵先生文集》卷八。

② 《古灵先生文集》卷七。

③ 《欧阳文忠公集》卷三五。

居,皆无他物,惟案上有韵一册,杜诗一集,笔砚而已。”由此足觐一地风气。

《容斋四笔》卷五引吴孝宗嘉祐中所作《余干县学记》,述当时南方人文之盛道:“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,宋受天命,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,冠带诗书,翕然大肆,人才之盛,遂甲于天下。”以诗赋取科第而步入仕途,是当时南方士子普遍所走的道路。相反,北方士子面对的是同样的科举,却未必有此风气(详后)。这说明将南人喜词章完全归咎于科举,并不符合事实,在这里,文化传统与价值观即所谓“俗”的力量,或者更大一些。

由于南北学风、文风的不同,而科举用同一把尺子取人,便显得很不公平,进而引起争论,使我们可以窥见当时北方的状况。英宗治平元年(1064),知谏院司马光评审中书省批送的太子中舍、知封州柳材请求省试逐路取人的奏状。柳材鉴于科举取人中南北失衡所造成的不公,在奏状中提出“逐路取人”,主张试卷标“在京”、“逐路”字样,“乞于‘在京’、‘逐路’以分数(录取指标)裁定取人,所贵国家科第均及中外”。司马光同意柳材的意见,并上《贡院乞逐路取人状》。他在状中据贡院簿籍所载,考列了嘉祐三年(1058)、五年(1060)、七年(1062)监府路分的得解、免解人数,及第人数,以及及第者在发解人数中所占比例,可直观地看出国子监、开封府与各路(特别是北方各路)的差别十分悬殊,说明确实存在不公。对此,时任参知政事的欧阳修不以为然,上《论逐路取人劄子》驳柳材和司马光之请,共举理由六条,其第一条论进士录取的南北失衡问题,道:

盖言事之人,但见每次科场,东南进士得多,而西北进士得少,故欲改法,使多取西北进士尔。殊不知天下至广,四方风俗异宜,而人性各有利钝。东南之俗好文,故进士多而经学少;西北之人尚质,故进士少而经学多。所以科场取士,东南

多取进士，西北多取经学者，各因其材性所长，而各随其多少取之。今以进士、经学合而较之，则其数均；若必论进士，则多少不等。^①

这里我们且不论“逐路取人”是否可行，透过欧阳修的奏札，可看出这样的事实，即南、北之“俗”不同：东南之俗好文，故长诗赋而多进士；西北之人尚质，故习经学而多明经。如果再读司马光《上始平公（庞籍）述不受知制诰启》，从他剖露心迹的文字中，也可看到这点。他写道：“光自幼读经书，虽不能钩探微蕴，比之佗人，差为勤苦尽心而已。又好史学，多编辑旧事，此其所长也。至于属文，则性分素薄，尤懒为之。当应举时，强作科场文字，虽仅能牵合，终不甚工。”^② 如果与欧阳修少时所习比较，则是很有趣的，其《记旧本韩文后》曰：“是时天下学者杨、刘之作，号为时文。能者取科第，擅名声，以夸荣当世，未尝有道韩文者。予亦方举进士，以礼部诗赋为事。年十有七，试于州，为有司所黜。……后七年，举进士及第。”^③ 一个“自幼读经书”，一个“以礼部诗赋为事”，正体现了南、北学风的差异。因此，欧阳修（今江西人）、司马光（今山西人）的这场争论，分别代表了南、北士人的利益，反映了南、北之间由于所习不同而在科举竞争中引发出的矛盾。

虽然柳材、司马光的建议当时未被采纳，但人们仍在寻求办法，以解决客观存在的不公。宋敏求尝上奏道：“河北、陕西、河东举子，性朴茂，故登第者少。请令转运使择荐有行艺材武者官之，使人才参用，而士有可进之路。”^④ 熙宁二年（1069），范纯仁在《奏

① 《欧阳文忠公集》卷一一三。

② 《司马公文集》卷五九。

③ 《欧阳文忠公集》卷七三。

④ 《宋史》卷二九一《宋绶传》附《宋敏求传》。

设特举之科分路考校取人》中也说：

窃以自祖宗以来，取人惟进士科为盛，凡举择公卿近侍，多取进士出身之人，故天下之士，竞务此科而进。然进士举业，文、赋惟闽、蜀、江、浙之人所长，至南省，则与西北之人一处糊名通考，故西北之人得进者少。今若明行分别，则必东南之人兴难进之嗟，而寄贯巧伪者益多。不若用前来所上贡举之策，先于天下郡县各立学校养士之法，仍择明师以教之，每科诏之下，委州郡长吏及学官于进士、明经中惟取……才行优于众人者，许用解额中人数三分之一，特为荐送至南省，谓之特举之科，南省只试策论、经义，仍各分路分改校，逐路各与优立分数取人，至御前亦依分数与放及第，则诸路得人，无不均一。朝廷遂于贡举优立五路之法。^①

从所引末句可知，朝廷当时盖采纳了范纯仁的建议，在贡举中“优立五路之法”^②。王明清《挥麈前录》卷三记载了“五路举子”疏于

① 《范忠宣公奏议》卷上。

② 按《宋会要辑稿·选举》三之四五：“（熙宁）九年（1076）正月十三日，编修贡院敕式所言：‘欲乞京东、陕西、河北、河东、京西五路到省举人并府监诸科改应进士人，各作一项考校，将分数均取。从之。’当先已有五路取士之法，至此方编入敕式。又据《宋会要辑稿·选举》四之二四：南宋高宗绍兴元年（1131）八月十九日诏：‘五路举人依旧制别项考校，每一十四人取一名，如有零分，听更取一名。’原注：‘已而滑州进士翟陈珍乞依建炎二年（1128）例，与诸路进士袞同考校，得旨依。自后每举皆袞同考校。’所谓‘建炎二年例’，当即建炎元年十二月一日诏所规定的办法：‘纽计正解、免解、转运司正解（引者按：即别头试正解）并袞同，合以一十四人取一名，余分不及一十四人，亦取一名，不终场者不计’（同上《选举》四之一七）。则南宋间亦有五路之法。然其时已丧失了旧有五路的绝大部分土地，盖只是优待流寓而已。

为文的一例：

国初，每岁放榜，取士极少。如安德裕作魁日，九人而已，盖天下未混一也。至太宗朝浸多，所得率江南之秀。其后又别立分数，考校五路举子，以北人拙于辞令，故优取。熙宁三年(1070)，廷试罢三题，专以策取士，非杂犯不复黜。然五路举人尤为疏略。黄道夫榜传胪，至第四甲党铸卷子，神宗大笑曰：“此人何由过省？”知举舒信道对以五路人，用分数取，未名过省。上命降作第五甲末。

所谓“分数”，即专门划拨给五路举子的指标。五路举子固非皆如党铸之拙鲁，但可见五路之法的确对北方士子有很大照顾。范纯仁与柳材、司马光提议不同的是，他在主张设“特举之科”（省试免试诗赋）及按逐路别立分数的同时，又提出“天下郡县各立学校养士之法，仍择明师以教之”。这有利于发展各地的教育，逐步缩小南北差距，即所谓标、本兼治，或者说是顾及“调停”与“造就”两个方面，以期从根本上解决南北学风、文风不同的问题。如果单按逐路取士，像明、清时科场分南卷、北卷、中卷，顾炎武以为“此调停之术，而非造就之方”^①。

元丰元年(1078)十月，苏轼在《徐州上皇帝书》中写道：

昔者以诗赋取士，今陛下以经术用人，名虽不同，然皆以文词进耳。考其所得，多吴、楚、闽、蜀之人，至于京东、西，河北，河东，陕西五路，盖自古豪杰之场，其人沈鸷勇悍，可以任事，然欲使治声律，读经义，以与吴、楚、闽、蜀之士争得失于毫厘之间，则彼有不仕而已，故其得人常少。……故臣愿陛下特

^① 顾炎武《日知录》卷一七《北卷》。

为五路之士，别开仕进之门。^①

在苏轼看来，就是实行五路取人法，仍没有解决南、北不均的问题，因为北人不仅“治声律”不及南人，就连“读经义”也难与南人相抗，因为诗赋、经义同属“文”（广义），而北人所长惟“沈鸷勇悍”的武事而已，文化自来落后^②。

科举考试是社会文化的缩影。从上述北宋科举情况，既可具体地看出南北文学之不同，以及统治者为解决“不同”在取士中所造成的矛盾的努力；又可见这种局面的形成原因十分复杂，除历史因素（如北方多战乱）及《南北文学不同论》所论及的自然条件差别外，则是文化传统的差异。《文献通考》卷三二《选举五》曰：唐时进士、明经二科盛，“是时有记问者则得明经，有辞藻者则得进士。当时南北未分，两边各自设科。”可见南北异辙，由来已久。钱钟书曾说：

把“南”、“北”两个地域和两种思想方法或学风联系，早已见于六朝。其实《礼记·中庸》说“南方之强”省事宁人，“不报无道”，不同于“北方之强”好勇斗狠，“死而不厌”，也就是把退敛和进取分别为“南”和“北”的特征。《世说·文学》第四：“孙安国曰：‘南人学问清通简要。’褚季野曰：‘北人学问渊综广博。’支道林曰：‘自中人以上，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，南人看书如牖中窥日。’”……孙、褚两人分举南、北“学问”各有特长；支

^① 《苏轼文集》卷二六。

^② 《文献通考》卷三二《选举五》曰：“熙宁间，荆公罢词赋、帖经、墨义，并归进士一科，齐、鲁、河朔之士往往守先儒训诂，质厚不能为文辞，所以自进士科一并之后，榜出多是南人预选，北人预者极少。”则罢诗赋后，科举的南北矛盾反而更加突出，可与苏轼上书参读。

表示同意,稍加补充,说各有流弊,“中人”以下追求博大,则流为浮泛,追求简约,则流为寡陋。^①

钱先生引证的是南北治学方法之不同,我们也可从中窥见南北好尚与价值观的异向。大约“北人学问渊综广博”,故以“记事析理”为长(《南北文学不同论》语),而善治经义;南人“清通简要”,学问却“简约”“寡陋”,便喜采撷丽藻,发为辞章。这种异同本无所谓高下优劣,各从其俗、顺其性而已;有司设科取士强分贵贱,那只是科举制度自身的失误甚至荒唐。

二、南宋:“崇性理、卑艺文” 氛围下的文学趋同

南北学风与文学不同,并非凝固不变,以史观之,不少时候又在往“同”的方向发展。如南北朝时期,南、北文学相差悬殊,但双方的对流互动并没有因此停止。唐初人刘知几在《史通》中说:“自梁室云季,雕虫道长(原注:谓太清以后),平头上尾,尤忌于时,对语俚词,盛行于俗,始自江外,被于洛中。”^②这是由南渐北。李延寿《北史·文苑传序》论南北朝时期南北文学之异后,接着写道:“若能掇彼(指北朝)清音,简此(指南朝)累句,各去所短,合其两长,则文质彬彬,尽美尽善矣。”这是主张南北融合。到盛唐时代,诗歌的南北融合基本实现,而臻于“风骨兼备”,那时的南北文学差距,应

^① 钱钟书:《中国诗与中国画》,《旧文四篇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。

^② 浦起龙《史通通释》卷一八《杂说下》。

该说是不大的。

历史上也有由北暨南,进而由北方学术和文风逐渐统治南方的时代,那就是南宋。

“靖康之变”使北宋灭亡,政权南渡。就原有疆域论,这时只有南而无北;就国民论,由于北人大量流寓江南,旧有的南、北格局被打破,部分北人与南人在淮河、秦岭以南融为一体。但是学风与文学并没有因此而立刻划一。南宋初,“南体”仍占主导地位:诗学“江西”,文则欧、苏。到孝宗乾兴、淳熙时,随着理学的勃兴,文学的嬗变也加快了步伐,“南体”、“北体”,旗鼓相当。到嘉定“庆元党禁”弛禁、特别是宋理宗之后,“程朱理学”统治了整个思想学术界,“北体”遂占据优势。前引刘师培《南北文学不同论》论南宋文学时,称“南宋诗文,多沿古制”,又接着写道:

若真、魏之文,缜密端恣,诚哉中流之砥柱矣。若夫东莱之文,稼轩之词,亦近纵横;朱子之文,雅近真、魏。

“真、魏”指真德秀(1178—1235)、魏了翁(1178—1237),他们是朱熹后最著名的理学家,又都是南人(真,今福建浦城人;魏,今四川蒲江人)。刘师培所谓“古制”、“缜密端恣”,到底属南属北?他没有说明。然而既谓“惟同甫、水心,文体纵横”云云,则是以陈亮(同甫)、叶适(水心)等人为南体,其余作家皆北体了。要之,刘师培对南宋文学的面貌,认识似不够明朗,但他指出“多沿古制”,盖即理学家所谓的“体本乎古,指近乎经”^①,实即理学诗文,似乎他已感

^① 真德秀《文章正宗序》:“夫士之于学,所以穷理而臻用也。文虽学之一事,要亦不外乎此。故今所辑,以明义理、切世用为主。其体本乎古,其指近乎经者,然后取焉;否则辞虽工亦不录。其目凡四:曰辞命,曰议论,曰叙事,曰诗赋。”

到这时理学文学已占主导地位(“中流砥柱”),并已大面积地趋同;北宋时期南北人因喜词章、尚经义而风气文风各异的局面,也因理学的勃兴而改变。

作为北体的理学文学,浸淫南体诗赋词章并逐步趋同的历程,大致经过了如下几个阶段。

1. 北宋中期:理学创立。上节引欧阳修上《论逐路取人劄子》在驳柳材、司马光时,谓“人性各有利钝”云云,多少表现出南人善文的优越感;但他没有料到的是,与之同时而稍晚的周敦颐(1017—1073,今湖南道县人)这时正在创立理学(又叫道学,现代或称“新儒学”),在理学史上被尊为“开山之祖”。接着,张载(1020—1077,今河南开封人,侨寓陕西眉县横渠镇)创立“关学”,二程(程颢,1032—1085;程颐,1033—1107,今河南洛阳人)兄弟创立“洛学”。理学的开山祖虽是南人,然其巨擘则皆北士。刘师培《南北理学不同论》谓周敦颐属“南方学派”,二程是“南学北学两派相融”,张载乃“北学之菁英”。但在文学思想方面,周敦颐倡“文以载道”说,以为“文辞,艺也;道德,实也。……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,艺焉而已”^①,已与南学大异其趣了;程颐干脆说“作文害道”^②,则是典型的排斥词章的北学腔调。在他们看来,问题不在科举“逐路取人”或通过“择明师以教之”来解决南北文学不同的问题,而是南人“以文辞为能”应当根本否定,只有“道”才高于一切。这种近乎极端的主张,在当时并未成为主流思潮,后来又受到王安石“新学”的打压。但到靖康南渡之后,它却得到长足的发展。

2. 南宋初:理学由西北向东南转移。明人沈晖《正德重刊龟山先生文靖杨公集序》曰:

① 《周子通书》卷二八《文辞》。

② 《二程语录》卷一一。